

企业规模分布“中间迷失”现象研究进展^{*}

张少华 张天华

内容提要:“中间迷失”指的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规模分布呈现“双峰分布”特征,即小微企业和大企业的数量很多,而中小企业的数量相对较少。学者们对“中间迷失”的研究逐渐经历了从个案研究到大型调查研究,从探究金融因素的影响拓展至探究各种影响因素的由浅入深的阶段,并且发现“中间迷失”已经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普遍现象,是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重要原因。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中间迷失”问题是,与大批国有企业进入世界 500 强相比,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的广大民营企业难以做强做大。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两类企业遭受的偏向性政策干扰了它们的动态演进过程,导致它们之间的发展差异。

关键词:中间迷失 企业规模分布 融资约束 资源错配

一、“中间迷失”的含义

“中间迷失”(The Missing Middle)指的是,相比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规模分布呈现“双峰分布”特征,即小微企业和大企业的数量很多,而中小企业数量(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相对较少。而且,“中间迷失”已经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重要原因(Hsieh & Olken, 2014)。

理论上讲,保持一个好的企业生态系统对一国经济增长和发展至关重要。自熊彼特(Schumpeter, 1942)的开创性工作以来,经济学家对企业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广泛讨论。具体而言,不同规模企业对一国经济增长发挥着各自特有的作用。大企业是创新之源,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张,创新活动会以更大比例展开,创新潜力会以更快速度被挖掘。小微企业是活力之源,更小、更年轻以及更灵活的小微企业可以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新产品的引入以及创业创新人才的选择而使经济发展保持活力(Dietrich, 2010)。中小企业不仅是解决就业的主要场所和保持创新活力的主要机构,而且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和减少贫困的主力军。在经济全

球化时代,中小企业还有着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获取开放红利(Beck et al, 2008; ADB, 2013)。

可见,一个企业的规模分布对经济增长和发展至关重要。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广大中小企业在整个企业生态系统中扮演着媒介和脊梁的作用,是小微企业成长为大企业的必然阶段,是一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顶梁柱。俗话说得好:“腰部要硬”,就是对广大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生动刻画。但是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相比于大量的大企业和小微企业,中小企业的成长却遭遇了各种现实困境,文献中称之为“中间迷失”。

国外学者对“中间迷失”现象的普遍性以及产生根源进行了广泛研究,对“中间迷失”的研究也逐渐经历了从个案研究到大型调查研究、从探究金融因素的影响拓展至探究各种因素的影响的由浅入深的阶段。国内学者则主要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全部国有企业和产值超过 500 万元的非国有企业)对我国工业企业的规模分布进行了检验与识别,但由于微观普查数据的缺乏,至今没有学者检验中国是否存在“中间迷失”现象。

^{*} 张少华,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邮政编码:510006,电子邮箱:ahual688@126.com;张天华,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邮政编码:510631,电子邮件:zhangth1985@gmail.com。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673253);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般项目(17NDJC253YB);国家留学基金资助项目。感谢审稿专家修改建议,文责自负。

二、“中间迷失”的现象识别

(一) 国别个案研究

Dhar & Lydall(1961)首先观察到印度企业存在规模分布的二元特征,即后来称之为“中间迷失”的现象。随后, Little & Page(1987)进一步证实了印度制造业存在“中间迷失”现象。Mazumdar & Sarkar(2013)采用2005年的企业普查数据研究发现,“中间迷失”现象在2005年依然存在。具体而言,6~49个雇员的小企业占比超过55%,500个雇员以上的大企业占比20%,与此同时,50~499个雇员的中型企业占比不足25%。Hasan & Jandoc(2013)基于1994年、2000年和2005年的企业普查数据同样证实,在2005年,有将近85%的人在少于50个雇员的小企业就业。这些数据表明,印度制造业的这种“中间迷失”现象不仅存在而且持续了20多年。

起源于印度制造业的这种“中间迷失”现象引发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许多学者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进行了检验。Phillips & Bhatia-Panthaki(2007)分析了赞比亚的“中间迷失”问题,发现占有企业比例94%的大量小微企业提供了68%的就业,小企业占比为5%,而中型企业和大型企业占比分别只有0.4%和0.06%。Badrul & Akhter(2014)发现,尽管孟加拉国的中小企业贡献了大部分的就业创造,但是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却导致了该国严重的“中间迷失”现象。Goyette(2014)研究了乌干达的“中间迷失”现象,发现企业规模分布相比发达国家更加右偏,有着大量的小企业,而中型企业和大企业相对较少。乌干达“中间迷失”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税收环境与制度环境有利于小企业的生存与成长,而中型企业则要上交更多的税收和进行更多的贿赂。因此,乌干达的企业规模分布特征是企业家为了规避税收和管制成本而理性选择的结果。

Tybout(2000)较早地对多个发展中国家是否存在“中间迷失”现象进行了综合研究。研究结果发现,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规模分布确实存在“中间迷失”现象(具体参见该文表1总结的各国“中间迷失”现象)。Alfaro et al(2008)实证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规模分布比发达国家的规模分布更加左偏,说明在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小微企业。Goyette(2014)采用世界银行企业

调查数据中的43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样本进行研究发现,中型企业和大型企业的比重与国家人均收入正相关,小企业比重与国家的人均收入负相关。进一步的观察发现,穷国有更多的小企业,发达国家则有更多的大企业,中型企业的出现与国家政策环境有关。

Hsieh & Olken所发表的论文《消失的“中间迷失”》(2014)无疑是该研究领域的一篇重要文献。他们采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的微观企业数据,从企业规模分布、“中间迷失”理论基础、税收和管制对企业规模分布的影响,以及“中间迷失”误解的根源等四个方面对“中间迷失”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1)企业规模分布并不存在文献中所谓的“中间迷失”,三个国家企业规模分布呈右偏特征,存在大量小企业,不仅中型企业迷失,而且大企业也迷失了。(2)资本和劳动的平均回报也没有呈现出“双峰分布”(bimodal size distribution)特征,中间投入的平均回报是右偏的。大企业的资本边际成本和劳动生产率都相对于中小企业较高。而根据“中间迷失”的理论预测是,大企业和小企业资本回报相对较低,中等企业资本回报相对较高。(3)即使考虑税收和管制对企业规模分布的影响,这三个国家的企业规模分布也没有出现分布不连续现象和分布群聚现象。(4)“中间迷失”产生的根源在于错误地将“就业份额分布”(employment share distribution)当作“企业规模分布”(firm size distribution)。该文认为,Leidholm & Mead(1987)、Tybout(2000)等学者提出的“中间迷失”现象本质上指的是这样一种事实: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型企业(企业雇员在10~49个之间)就业份额与大型企业(50个或者更多的雇员)和小型企业(少于10个雇员的企业)的就业份额相比相对较低。如果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的企业数据刻画就业份额分布的话,同样可以得出“中间迷失”的结论,即就业份额分布呈现“双峰分布”特征。

(二) 大型调查研究

随着“中间迷失”现象在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得到证实,一些著名的国际金融机构,比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欧洲中央银行等,和私人部门也开始进行大型调查,研究“中间迷失”现象的普遍性以及造成“中间迷失”现象的原因。表1是基于专家和学者承担的10项大型调查得出的结论,他们研究了世界各地对中小企业成长和发展施加的制约因素。

表 1 关于“中间迷失”现象的大型调查研究

	来源	名称和年份	调查范围	前四大障碍因素
1	Edinburgh Group Report, 2012	IFAC SMP Quick Poll, 2012	世界范围	管制负担; 经济不确定性; 上升的成本; 融资约束
2	Pasadilla, 2010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Survey(BEEPS), 2005	27 个国家(主要是东欧和中亚国家)	税率; 税收管制; 融资成本; 腐败
3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Report, 2013	Entrepreneurship Framework Conditions Main Indicators, 2013	世界范围内的 69 个经济体	创业融资; 政府政策; 政府创业计划; 创业教育
4	Shinozaki, 2012	(IFC)2010 stocktaking report on SMEs to the Group of Twenty (G20), 2012	亚洲	限制获得融资; 其他因素; 缺乏熟练工人; 脆弱的内部控制和管理文化
5	Kuntchev et al, 2013	The World Bank Enterprise Survey, 2013	世界范围内的 116 个国家	中小企业比大企业更容易受到信贷约束; 信用约束状态; 完全信贷约束; 17% 的中小企业; 没有信贷约束; 38% 的中小企业
6	European Central Bank	Survey on the access to finance of SMEs in the Euro Area (SAFE), 2013. 10 — 2014. 03	欧盟的 7520 家企业	客户资源; 生产成本; 劳动力成本; 融资约束
7	Ardic, Imboden & Latortue, 2013	Financial Access Survey (FAS) information taken Financial Access Survey, 2013	186 个国家的年度数据 (2004 — 2012)	融资约束; 投资补贴; 防范风险; 基础设施
8	Rocha et al, 2010	A joint survey of the Union of Arab Banks and the World Bank, 2010	中东和北非地区	金融基础设施薄弱; 信用信息薄弱; 债权保护不力; 基础设施薄弱
9	IFC & The World Bank	The World Bank, Doing Business, 2013	南亚	合同执行效力; 跨国交易; 获得电力能力; 产权登记
10	Schiffer & Weder, 2001	Private Sector Survey, 2001	世界范围内的 80 个国家	融资约束; 税收法规; 通货膨胀; 腐败

注:作者根据文献整理。

在这些调查中,受访者既有来自发达国家的管理者也有来自发展中国家不同地区的管理者。这些调查对影响中小企业成长的制约因素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快照。从表 1 可以看出,各种调查得出的阻碍中小企业成长和发展的主要因素有:(1)融资约束和金融基础设施薄弱;(2)政府法规和税收政策不合理;(3)接入电力(特别是能源)的限制;(4)经济和政治不确定性;(5)劳动力技能缺乏和非正式的竞争。

三、“中间迷失”的影响因素分析

学者们对“中间迷失”的研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现象检验上面,而是进一步深入挖掘造成“中间迷失”的原因。无论是早期的个案研究还是后来的多国经验研究,以及最近十几年的大型调查研究,学者们起初发现融资约束是造成“中间迷失”的主要因

素,后来发现其他因素(劳动管制、产业政策、税收扭曲等)也会造成企业规模分布的扭曲。

(一)融资约束

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一直是困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国际性难题。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因为各种因素(缺乏抵押物、资信证明困难,较少现金流、信用不足的历史、较高风险溢价、欠缺银行借款关系和较高交易成本等),中小企业难以取得银行融资,尤其是长期贷款,进而影响了它们的运营和发展,这一点已经被大量研究所证实。Berger & Udell(2006)提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关于中小企业融资的概念性框架。基于这个框架,他们分析了金融结构是如何通过各种信用贷款技术(包括财务报表贷款、小企业信用评级、以资产为基础的贷款、保理业务、固定资产贷款、租赁、关系借贷以及贸易信贷等)影响中小企业的信贷可得性的。Beck &

Demirgüç-Kunt(2006)指出,尽管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中小企业都是私人部门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跨国经验也表明中小企业对一国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因果效应,但是大量证据也表明,中小企业无法从正规的金融体系进行融资。这种融资约束和增长约束不仅扭曲了企业规模分布,而且会危害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他们进一步指出,金融和制度发展能够缓解广大中小企业面临的这种增长约束,即使在一些欠发达的制度环境中,一些特殊的融资工具,例如租赁和保理业务等,仍然对中小企业的融资起着重要作用。

Luís & José(2003)基于葡萄牙制造业数据研究发现,企业规模分布严重右偏,随着时间演变才变为对数正态分布,融资约束是解释企业规模分布右偏的重要因素。Angelini & Generale(2008)研究了意大利企业的融资约束和企业规模分布的关系,发现融资约束和企业规模之间的负向关系能得到证实,存在融资约束的企业平均规模要小于没有融资约束企业的平均规模,而且存在融资约束的企业规模分布向右倾斜,融资约束对小企业和年轻企业的规模扩张影响更大。

既然金融机构发展有助于创造一个中小企业和大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那么缺乏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是否可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中间迷失”现象?Beck et al(2005)研究表明,金融发展对由更多小企业构成的产业发展提供了更大程度的激励。这实际上说明金融发展对小企业的助推作用大于大企业,克服金融市场摩擦能够为不同规模的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还有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不仅能够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而且能够帮助获得金融服务的新企业家在市场上存活超过1年(Demirgüç-Kunt et al, 2007),并且帮助企业以更快的速度创新(Ayyagari et al, 2007)。Didier et al(2014)研究了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融资对企业增长和规模分布的影响,发现能够进入资本市场发行证券的企业增长更快,这种特征在企业发行年度、小企业和年轻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发行者的企业规模分布与非发行者的企业规模分布也明显不同,对于发行者而言,小企业比大企业增长得更快,这种收敛机制导致发行者的企业规模分布倾向于收紧;对于非发行者而言,大企业比小企业增长得更快,这种发散机制导致非发行者的企业规模分布倾向于变宽。

随着“中间迷失”问题研究的深入开展,学者们越来越意识到其他因素对发展中国家企业规模分布也有影响。对于最早产生于印度的“中间迷失”现象,学者们就已经从就业保护政策、劳动管制、小规模产业变化政策以及财政激励等方面进行了解释。Badrul & Akhter(2014)发现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是导致孟加拉国出现“中间迷失”现象的主要原因。Goyette(2014)发现乌干达的“中间迷失”问题根源在于小企业生存与成长的税收环境与制度环境更加有利,而中型企业则要上交更多的税收和支付更多的贿赂。

(二)各种管制措施

各种管制措施对企业成长所施加的影响,就如同需要事先支付的一种沉没成本或者隐性税收。Krueger(2007)在分析了印度企业规模分布和经营环境之后认为,管制环境无疑是解释印度“中间迷失”的一种重要因素,所以去除管制是修复“中间迷失”的必由之路。Garicano et al(2013)研究了法国劳动力管制对企业规模分布的影响,发现管制增加了雇员超过50人企业的劳动成本,因此会扭曲企业规模分布,进而影响企业生产率水平。研究还表明,如果工资可以灵活调整的话,管制造成的效率损失仅仅占GDP的1%,如果存在工资粘性的话,管制造成的效率损失则会超过5%。同时发现,无论工资是否可以灵活调整,大企业的股东都是管制的主要受害者,而小企业的工人则是管制的主要受益者。

Gourio & Roys(2014)同样发现,法国的劳动力管制对企业成长以及效率提升的影响巨大。在法国,超过50个雇员的企业将不得不接受更多的规制,造成法国企业规模分布明显的扭曲特征,即存在大量的只有49个雇员的企业。他们发现,企业规模一旦达到50名雇员,需要支付的沉没成本相当于该企业一年的工资总额。劳动管制还限制了新企业进入和现有企业规模的扩张,导致劳动力资源错配。去除这种劳动力管制不仅可以提高劳动力跨企业配置,而且还可以提高0.3%的全要素生产率。在企业规模分布上,去除管制最明显的结果就是中型企业更快速的规模扩张和成长。

需要区分的是,Garicano et al(2013)和Gourio & Roys(2014)都研究了法国劳动力管制对企业规模分布的影响,但前者侧重管制的劳动税效应和总体规模分布,而后者强调管制的沉没成本特征以及侧重门槛

上的企业分布特征。与这两篇文献强调管制政策对企业规模分布与生产率的影响不同,Chari(2011)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印度实行的解除企业规模与进入约束政策带来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解除对企业规模的限制可以提高总量生产率约5%~6%,解除进入限制可以提高总量生产率15%~16%。生产率的分解分析表明,这种改革的短期经济效应来自在位企业对规模的调整,长期经济效应来自新进入者带来的扩张效应。

无独有偶,Alfaro & Chari(2014)同样研究了印度1991年实行的新产业政策对企业动态规模和产业之间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管制的放松,资源错配程度大大下降;企业规模分布出现左边“肥尾”特征,说明放松管制导致了小企业数量大大增加。分位数回归分析进一步表明,放松管制对企业规模分布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印度制造业的企业规模分布仍然表现为“中间迷失”特征,说明小企业仍然面临着成长约束。

(三)其他因素

大量研究还发现了扭曲企业规模分布的其他因素。Brunetti et al(1998)基于世界范围内的管理人员调查研究发现,不发达国家的企业通常面临着各种体制上的障碍,例如价格管制、外汇和贸易法规风险、政策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法规成本等,这些制度因素都会形成对某一类特定企业的偏爱与歧视,从而扭曲企业规模分布。Kumar et al(1999)发现在一些所有权和专利保护更好的国家,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和研发密集型产业的企业平均规模更大。Laeven & Woodruff(2003)基于墨西哥各州的数据证明,法律体系效率和企业规模高度相关。Beck & Demircug-Kunt(2006)的跨国研究表明,良好的金融发展和法律系统有助于企业规模的扩张。Krueger(2007)强调基础设施瓶颈对企业规模扩张与成长有很大影响。Ramaswamy(2013)认为印度广泛存在的对小企业的就业保护政策和财政激励政策会影响企业的规模扩张策略,小企业如果发现扩张规模带来的收益小于现在的各种保护补贴,就会维持现状,而“中间迷失”正是小企业在政策带来的成本和收益之间权衡的结果。Goyette & Gallipoli(2015)分析了税收环境和信贷约束对企业投入选择和规模分布的影响。研究表明,“中间迷失”只不过是前瞻性的企业应对税收环境的最优选择,是税收扭曲导致的副产品,会导致一定程度的效率损失。

传统理论认为,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可以解释它们之间的规模差异,但是Holmes & Stevens(2014)认为企业之间功能上的差异才是解释企业规模差异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大企业生产标准化产品,而小企业生产消费品或者专业品。这种功能差异导致企业规模分布高度倾斜,即小企业的数量远远超过大企业。大量研究还表明,财政因素是解释“中间迷失”现象的重要因素。Keen & Mintz(2004)还分析了基于成本和效率选择的企业上缴增值税的门槛值,他们的模型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规模分布陷阱提供了一种理论解释。

四、中国企业规模分布研究

国内学者开展中国企业的规模分布的研究相对较晚,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微观企业数据的缺乏。所以直到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9—2007)出现后,中国企业的规模分布研究才大量开展起来。现有研究也主要关注中国企业规模分布特征与影响企业规模分布的因素两个方面。

(一)企业规模分布识别研究

对企业规模分布的传统认识建立在“吉尔伯特法则”(Gibrat's Law)基础上。Gibrat(1931)发现企业规模变化是一个随机游走过程,即企业成长不受自身规模的影响,这一经验结论又被称为比例效应法则(Law of Proportional Effect)。后来,学术界对企业规模分布的经验研究主要是围绕“齐普法则”(Zipf's Law)展开。“齐普法则”认为企业资产规模不仅服从Pareto分布,而且其幂指数(或Pareto指数)接近于1。方明月和聂辉华(2010)利用1999—2005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首次对中国企业的规模分布进行检验发现,工业企业总体规模分布偏离了Zipf分布,并发现国有企业进入壁垒是导致偏离的主要原因。使用同样的数据库,杨其静等(2010)不仅通过测算帕累托指数对工业企业规模分布状态进行了考察,还在此基础上从市场和政府的角度对企业规模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高凌云等(2014)采用2004和2008年的中国经济普查数据中的全样本工业企业数据库,重新研究了中国工业企业的规模与生产率分布特征。研究表明,中国企业整体上仍面临扩张约束,较大规模企业所占比重略小于目标状态;部分规模较大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实际不高,存在明显的资源错配问题。这意味着,中国一些工业企业不仅难以做

大,而且存在大而不强问题,进而导致了严重的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

(二)企业规模分布影响因素研究

1. 融资约束。方宇惟等(2014)以1999—2007年制造业各行业规模以上企业为样本,研究了所有制结构对企业外部融资约束和企业成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所有制企业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截然不同:国有企业显然不存在实际融资约束,而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不论在长期增长路径上,还是在短期增长上,都面临较大的外部融资约束。李洪亚等(2014)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企业规模分布存在“年龄依赖”和“规模依赖”,并非完全遵循“吉尔伯特法则”。融资约束制约企业成长,尤其显著影响了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小企业的成长率;总体上看,融资约束并不能决定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整体企业规模分布状况,然而却显著影响了制造业上市公司中小企业的规模分布。刘斌等(2015)采用1998—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研究发现,我国企业规模分布严重偏离 Zipf 法则的均匀分布。融资约束对不同规模企业的成长具有非均衡性影响,导致了企业规模分布的不均匀。Oaxaca-Blinder 分解证实了不同规模企业间的融资约束差异主要还是源于融资的“规模歧视”。

2. 环境规制。孙学敏和王杰(2014)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9—2011)测度了企业规模分布,发现中国工业企业规模分布的帕累托指数逐年提高。他们认为环境规制通过成本效应、创新补偿效应、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提高了企业规模分布的帕累托指数,使得企业规模分布变得更加均匀。

3. 贸易自由化。盛斌和毛其淋(2015)以中国加入 WTO 所引发的大范围关税减免为背景,使用1998—2007年关税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实证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成长及规模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规模分布状态严重地偏离 Zipf 分布,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规模分布的 Pareto 指数呈现上升的趋势,这一特征普遍地存在于不同行业 and 不同地区之中。贸易自由化提高了企业规模分布的 Pareto 指数,有助于使企业的规模分布变得更加均匀,进而缓解了对 Zipf 分布的偏离程度。贸易自由化对不同规模组别企业的成长率具有非对称的影响效应,即中小型企业从贸易自由化进程中获得了相对更快的成长机会,这也就

进一步解释了贸易自由化与企业规模分布状态之间的关系。

4. 政治关联。于蔚等(2012)研究了政治关联对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影响,发现政治关联具有资源效应,可以帮助企业进入高利润行业,有利于企业做大规模。但是建立和维持政治关联会对企业家的生产性活动产生挤出效应,从而会加重企业政策性负担并抑制企业创新。简而言之,政治关联在帮助中国民营企业做大的同时减损了其效率。

五、中国的“中间迷失”问题

尽管 Hsieh & Olken(2014)明确证明了发展中国家的“中间迷失”实际上就是企业就业份额分布呈现“双峰分布”特征。然而,由于“中间迷失”问题背后反映着一个国家企业规模分布的特征、企业动态演化的效率以及国富国穷等重大问题,所以,分析中国工业企业规模分布的典型事实,同时检验中国是否存在“中间迷失”现象的意义依然重大。国内大多数文献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来分析中国企业的规模分布特征(杨其静等,2010;方明月、聂辉华,2010)。但是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统计的企业对象是全部国有与产值超过500万的非国有企业,因此基于该数据库研究中国企业的规模分布就容易得出企业分布右偏的结论。这一数据库实际上截除了大部分分布于左边的、规模较小和生产率较低的样本企业(高凌云等,2014)。Hsieh & Olken(2014)也指出,由于中国缺乏微观普查数据,因此无法直接检验中国企业规模分布是否存在“中间迷失”现象。

本文认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科研工作者,必须将研究深入到本土情境中去,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和与之相对应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企业的建立和动态演进是披着各种“所有制外衣”的形式进行的,即带着不同所有制标签进入市场、退出市场以及市场中展开竞争、壮大发展(张少华、张天华,2015)。也就是说,在市场中竞争与生存的中国企业不仅存在规模上的异质性,而且存在所有制上的异质性。这就决定了研究中国企业的规模分布问题无法忽略企业所有制特征的影响。单就中国本土企业而言,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规模差异也十分巨大。根据《财富》杂志公布的2016年世界500强排行榜,2016年中国上榜企业已经达到创纪录的110家,连续5年超过日本,稳居世界第二,

距离世界第一的美国仅仅差 24 家。但是其中国有企业占据 87 家,港台企业占据 13 家,民营企业只有 10 家。这种反差极大的数据对比说明: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与大批国有企业已经进入世界 500 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的广大民营企业并没有完全做强做大。这就是中国的“中间迷失”问题。

事实上,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差异已经做了大量研究。在改革开放初期,基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经验和我国国有企业经营困境,学者们主要从产权保护、地方政府干预以及政策性负担等方面来解释国有企业低效和发展问题。与此同时,民营企业的发展非常迅猛,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的一支重要力量,也在中国进一步验证了产权理论的价值。

但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外资的大量进入,以及中国 2001 年加入 WTO,民营企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甚至最近几年还出现了“国进民退”的现象。国内外学者遵循主流文献,从金融体制、法律制度以及政策干扰等方面分析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差异问题。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较为滞后,银行信贷资源高度集中,导致金融市场配置资源时呈现明显的选择性压制或制度偏向(黄玖立、冼国明,2010),使得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能获得充足贷款,效率较高的民营企业往往无法得到应有的资金支持(Guariglia, 2008),这就是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全球商业投资环境调查表明,在 80 个样本国家中,中国是受金融约束最严重的国家,80%的民营企业认为融资约束是企业扩张的主要障碍之一(Claessens & Tzioumis, 2006)。Johnson et al(2002)以及 Wang et al(2004)发现,转轨经济的法律对私有财产权保护并不明确,造成私营企业的发展存在不确定性,面临较大的风险(被勒索、纠纷时受到不公平待遇等)。与西方国家私有产权保护制度较为完善相比,中国传统法律的首要目的是政治性的,即强化对于社会的政治控制(蔡宝刚,2005)。这种产权的不安全性对民营企业非常明显,表现为对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必然影响民营企业的成长。大量报道显示,尽管国务院分别于 2005 年和 2010 年出台了旨在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和民营企业投资的“非公经济 36 条”和“新 36 条”,但是民营企业的准入难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实质性缓解,企业在行业准入上频繁遭遇“铁门”、“玻璃门”和

“弹簧门”现象,准入矛盾依然非常突出。民营企业的这些遭遇与政府的偏向性政策密切相关。张天华和张少华(2016)研究证实,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迥异规模源自于这两类企业遭受了来自政府的偏向性政策。偏向性政策不仅包括直接的干预、帮扶与进入壁垒等,而且包括金融抑制、资源低税费与市场垄断等方式的暗补。同时,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中,有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民营企业只有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在行业中具有了相当的影响力,才会得到政府的认同。这从大量民营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建立政商关系可见一斑,而建立政商关系、成为政治关联型企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获得来自政府或明或暗的偏向性政策的“关照”。

总之,本文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中间迷失”现象本质上反映的是,学者们对发展中国家存在的这种不合理的企业规模分布,对长期经济增长与发展可能造成的严重影响的一种担忧。因此,“中间迷失”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企业规模分布问题,而且折射出发展中国家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应如何实现微观企业在规模分布上的动态演化,如何解除束缚在微观企业身上的各种约束,以及如何实现企业演化过程中资源有效配置与效率提升的问题。概言之,企业规模分布的形态反映了一国经济中稀缺资源在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配置效率,以及影响企业规模分布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各种因素。中国的“中间迷失”问题则反映了中国未来应如何克服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之间的巨大差距,如何改革现有的要素分配体制、扫除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帮助民营企业跨越“中等规模陷阱”,构建一整套有利于不同所有制企业成长和公平竞争的中立性政策体系,最终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总量生产率的提升。

参考文献:

- 蔡宝刚,2005:《私有产权保护的意​​义追问——以“李约瑟难题”的法律解答为例》,《法学评论》第 3 期。
- 方明月 聂辉华,2010:《中国工业企业规模分布的特征事实:齐夫定律的视角》,《产业经济评论》第 9 卷第 2 辑。
- 方宇惟 夏庆杰 李实,2014:《究竟是什么因素抑制了企业成长?来自外部融资约束分析的证据:1999—2007》,《产业经济研究》第 1 期。
- 高凌云 屈小博 贾鹏,2014:《中国工业企业规模与生产率的异质性》,《世界经济》第 6 期。
- 黄玖立 冼国明,2010:《金融发展、FDI 与中国地区的制造业

- 出口》,《管理世界》第7期。
- 李洪亚 史学贵 张银杰,2014:《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规模分布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当代经济科学》第3期。
- 刘斌 袁其刚 商辉,2015:《融资约束、歧视与企业规模分布——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分析》,《中国工业经济》第3期。
- 盛斌 毛其淋,2015:《贸易自由化、企业成长和规模分布》,《世界经济》第2期。
- 孙学敏 王杰,2014:《环境规制对中国企业规模分布的影响》,《中国工业经济》第12期。
- 杨其静 李小斌 方明月,2010:《市场、政府与企业规模分布个经验研究》,《世界经济文汇》第1期。
- 于蔚 汪淼军 金祥荣,2012:《政治关联和融资约束:信息效应与资源效应》,《经济研究》第9期。
- 张少华 张天华,2015:《中国工业企业动态演化效率研究:所有制视角》,《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3期。
- 张天华 张少华,2016:《偏向性政策、资源配置与国有企业效率》,《经济研究》年第2期。
- ADB(2013), “Asia SME, finance monitor”, from <http://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2014/asia-sme-finance-monitor-2013.pdf>.
- Alfaro, L., A. Charlton & F. Kanczuk(2008), “Plant-size distribution and cross-country income differences”, in: J. A. Frankel(ed), *NBER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Macroeconomic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Alfaro, L. & A. Chari(2014), “Deregulation, misallocation, and size: Evidence from India”,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57(4):897—936.
- Angelini, P. & A. Generale(2008), “On the evolution of firm size distribu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1):426—438.
- Ardic, O. P., N. Mylenko & V. Saltane(2013),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Across-country analysis with a new data set”,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5538.
- Ayyagari, M., A. Demirgüç-Kunt & V. Maksimovic(2007), “Firm innovation in emerging markets: Role of governance and financ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4157.
- Badrul, H. M. & T. Akhter(2014),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financing in Bangladesh: The missing midd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 Business Research* 4(4):295—308.
- Beck, T., A. Demirgüç-Kunt & V. Maksimovic(2005), “Financial and legal constraints to growth: Does firm size matter?”, *Journal of Finance* 60(1):137—177.
- Beck, T. & A. Demirgüç-Kunt(2006), “Small and medium-size enterprises: Access to finance as a growth constraint”,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0(11):2931—2943.
- Beck, T., A. Demirgüç-Kunt & V. Maksimovic(2008), “Financing patterns around the world: Are small firms different?”,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89(2):467—487.
- Berger, A. & G. Udell(2006), “A more complete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SME finance”,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30(11):2945—2966.
- Brunetti, A., G. Kisunko & B. Weder(1998), “Credibility of rules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a worldwide survey of the private sector”,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2(3):353—384.
- Chari, A. V. (2011), “Identifying the aggregate productivity effects of entry and size restricti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license reform in India”,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3(2):66—96.
- Claessens, S. & K. Tzioumis(2006), “Measuring firms’ access to finance”,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No. 2338.
- Demirgüç-Kunt, A., K. Leora & P. Georgios(2007), “The origins of self-employment”, World Bank mimeo.
- Dhar, P. N. & H. F. Lydall(1961), *The Role of Small Enterprises in Ind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Bombay: Asian Publishing House.
- Didier, T., R. Levine & S. L. Schmukler(2014), “Capital market financing, firm growth, firm size distribution”, NBER Working Paper No. 20336.
- Dietrich, A. (2010), “Explaining loan rate differentials between small and large companies: Evidence from Switzerland”,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38(4):481—494.
- Edinburgh Group(2012), “Growing the global economy through SMEs”, <http://www.edinburgh-group.org>.
- Garicano, L., C. LeLarge & J. V. Reenen(2013), “Firm size distortions and the productivity distribution: Evidence from France”, NBER Working Paper No. 18841.
- Gibrat, R. (1931), *Les Inégalités économiques*, Paris: France.
- Gourio, F. & N. Roys(2014), “Size-dependent regulations, firm size distribution, and reallocation”, *Quantitative Economics* 5(2):377—416.
- Goyette, J. (2014),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firms in Uganda”,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26(4):456—472.
- Goyette, J. & G. Gallipoli(2015), “Distortions, efficiency and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firms”, *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

- nomics 45:202—221.
- Guariglia, A. (2008), “Internal financial constraints, external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investment choice: Evidence from a panel of UK firms”,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32(9):1795—1809.
- Hasan, R. & K. Jandoc(2013), “Labor regulations and the firm size distribution in Indian manufacturing”, in: J. Bhagwati & A. Panagariya(eds), *Reforms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In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lmes, T. J. & J. J. Stevens(2014), “An alternative theory of the plant size distribution, with geography and intra-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2(2):369—421.
- Hsieh, C.-T. & B. A. Olken(2014), “The missing ‘missing middl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8(3):89—108.
- IFC(2013), IFC enterprise surveys, full Bangladesh country profile—2013, <http://www.enterprisesurveys.org>.
- Johnson, S., H. Ross & J. Brett(2002), “Property rights and fina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5):1335—1356.
- Keen, M. & J. Mintz(2004), “The optimal threshold for a value-added tax”,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8(3—4):559—576.
- Kuntchev, V. et al(2013), “What have we learned from the enterprise surveys regarding access to finance by SME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6670.
- Kumar, K., R. Rajan & L. Zingales(1999), “What determines firm size?”, NBER Working Paper No. 7208.
- Krueger, A. O. (2007), “The missing middle”, SCID Working Paper No. 343.
- Laeven, L. & C. Woodruff(2003), “The quality of the legal system and firm size”, World Bank, mimeo.
- Leidholm, C. & C. Mead(1987), “Small scale industr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mpirical eviden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od Security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apers No. 54062.
- Little, I. D. & J. Page(1987), *Small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India and Other Econom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uís, M. B. & M. José(2003),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firm size distribution: Facts and the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3(4):1075—1090.
- Mazumdar, D. & S. Sarkar(2013),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 in Asia: Size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Routledge and IDRC.
- Pasadilla, G. O. (2010), “Financial crisis, trade finance, and SMEs: Case of Central Asia”, ADBI Working Paper No. 187.
- Phillips, S. & S. Bhatia-Panthaki(2007), “Enterprise development in Zambia: Reflections on the missing midd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6):793—804.
- Ramaswamy, K. V. (2013), “Understanding the ‘missing middle’ in Indian manufacturing: The role of size-dependent labour regulations and fiscal incentives”,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https://ssrn.com/abstract=2271478>.
- Rocha, E. A. et al(2010), “The impact of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on the size of the micro,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sector: Preliminary findings from a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Procedia Economics and Finance* 4(3):335—349.
- Schiffer, M. & B. Weder(2001), “Firm size and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Worldwide survey results”, IFC Discussion Paper No. 43.
- Schumpeter, J. A. (194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Harper & Brothers.
- Shinozaki, S. (2012), “A new regime of SME finance in emerging Asia: Empowering growth-oriented SMEs to build resilient national economies”, ADB Working Paper No. 104.
- Tybout, J. R. (2000), “Manufacturing fir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ow well do they do, and wh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8(1):11—44.
- Wang, Xiaozu, Lixin Xu & Tian Zhu(2004), “State-owned enterprises going public: The case of China”,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2(3):467—487.

(责任编辑:刘新波)

(校对:刘洪愧)